

“农禅并重”的生存智慧及其多元价值

韩凝玉¹ 张哲²

(1.南京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并行而不害”,这是具有深厚文化智慧的农耕文明最高之善与极至之美的集中体现,而将其与禅宗完美结合的典型是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鲜明时代价值和意义的“农禅并重”。在梳理其丰富历史意蕴的基础上,阐述将世间法之“农”与出世间法之“禅”圆融为一体的生存智慧并在适度范围内汲取其精粹,探讨其保护和顺应自然对万物至善的生态价值,传播触类见道与缓解压力、以己为善的社会价值及弘扬伦理美德与耕读教育以慈济天下的文化价值等多元层面的价值意涵,在汇聚中国传统大生命观和禅宗哲学的基础上,以更强的责任感和至善之心不断追寻人与天地、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和谐相生。

【关键词】农禅并重;农耕文明;文化智慧;多元价值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1-0136-09

The Survival Wisdom of The "Valuing both Agricultural Zen" and Its Multiple Values

HAN Ning-yu¹ ZHANG Zhe²

(1.College of Horticultu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Abstract: In the concept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ll things coexist without bringing harm" embodies the highest goodness and ultimate beaut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ith profound cultural wisdom. By perfectly combing the above concept with Zen Buddhism, there occurs the "equal emphasis on agriculture and Zen Buddhism" with distinctive era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Zen Buddh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ich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expounds on the survival wisdom of integrating the "agriculture" in Loka-dharma with the "Zen Buddhism" in Lokottara-marga and absorbing its essence in an appropriate range. Meanwhile, it discusses its ecological value of protecting and conforming to nature and showing supreme goodness to all things, spreads the social value of "coming into contact is the Tao"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and taking good care of oneself,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promoting ethical virtues and combining labor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taking Tzu Chi a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converging traditional Chinese great outlook on life and Zen Buddhism philosophy, it constantly pursu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heaven, nature, society, and itself with a stron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heart of supreme goodness.

Key words: equal emphasis on agriculture and Zen Buddhis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wisdom; multiple values

[收稿日期] 2021-10-04

[作者简介] 韩凝玉(1977-),女,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景观文化;

张哲(1972-),男,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景观规划与设计。

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人不同于自然,是“心灵的生命”。农耕文明中尊重土地生长规律与生命开放,坚守和善的至高至坚的信仰是农业行为应存感激之心的标尺,是农业生存与发展可持续性的伦理依据^①。其所追求和善的至高信仰与禅宗追寻对生命的慈悲和自性的觉悟一致。禅宗对自性的照觉也体现在对天地规律合乎时宜的遵照与守候。这是大地与自我本身意义上的“物我互保”“物我交融”进而达到人与大地“物我两忘”的证悟。荷兰学者许理和也认为禅宗集中体现为一种生活和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

而将禅宗与农耕完美结合的典型就是由百丈怀海禅师完成的,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议题:“农禅并重”^②,是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逐渐与古代农业文明与生产生活方式等具体实践相合而生^③。其使农业突破以往仅提供食物功能进而转变为佛教修行的载体,不仅为僧侣提供生存资料,还提供修行“觉悟”之法门^④,是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在佛教文化层面的高度超越,更表达了禅宗中国化的修行理念与精神特质,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深入开展,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特色之一。

“农禅并重”历经千余年发展,作为中国佛教三大传统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独具价值与意涵^⑤,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意义。此处“农禅并重”的“禅”系指宗教学修,“农”是有益于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劳作,需大力发扬中国佛教之“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⑥。因而,在阐述中国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和佛教中国化在古代最为典型的标志“农禅并重”所蕴含的历史脉络基础上,解析“禅”与“农”的生存智慧及其多元价值,期望为人与天地、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和谐相生提供有益的多重选择和借鉴思路,以不断追寻对万物至善至美至坚的信仰。

一、“农禅并重”的历史发展脉络

禅宗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从南北朝开始,成宗于唐,北宋达到繁盛^⑦,明晚期趋于沉寂。禅宗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劳作与禅修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农禅并重”的禅修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禅宗农业。

“农禅并重”的思想渊源上溯至禅宗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二祖和三祖身处南北朝社会动乱时期,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运动”使寺院遭尽劫难,加之寺院受到严格限制和隐士文化的影响等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许多僧人被迫进入山林并在山林建造寺院,故而呈现出中国佛教“山林化”的“深山藏古寺”现象。

“农禅并重”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道安法师(312—385),他一边从事农业劳作,一边修行佛法,即佛教徒耕种农田,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⑧已经初具“农禅并重”的特征。

东汉建安年间(196—220),普净禅师在荆州玉泉山(今湖北当阳县)结茅安居,但直到南北朝时修行方式仍大多以游化、苦行和独居净室为主。魏晋之后僧人数量激增,一些寺院尽管有土地,但僧人自己不种地而由佃农代劳。这一现象依旧属于源于印度佛教的“供养制”,即食物由信徒供养,修行和传法方式遵循游化和乞食为主且没有固定居所,“行无轨迹,动无彰记”。

① 任继周:《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② 鞠彩萍:《唐宋禅籍著称的深层文化折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③ 王鸿生:《中国农业伦理学应该研究的九个问题》,《农业伦理学进展》(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43—247页。

④ 蔡泽旭:《禅学,取之不尽的心理学资源宝库》,第六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中国心理学会,北京,2012年7月6日。

⑤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

⑥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法音》1983年第6期。

⑦ 王建光:《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⑧ [梁]慧皎:《高僧传》卷5《道安传》,《大正藏》第50册,第351页下。

定居是禅宗农业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大规模聚居则使其农业耕种成为现实。真正将僧人种地落实于实践,并从制度层面形成“农禅并重”的理念,是从禅宗四祖道信(580—651)开始萌芽。道信禅师在湖北蕲州黄梅西北双峰山安居传法,此为汉传佛教史上的一大创举。同时,道信禅师带领僧人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自耕自食并与禅修结合。

“农禅并重”由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602—675)发扬光大,弘忍禅师继承道信禅师倡导的将“作”与“坐”并重的山林禅风并发扬光大,将“农禅并重”精髓贯穿于僧众日常生活与农耕劳动中进而使“农禅并重”的修学体系初具雏形。禅宗第六代祖师弘忍的弟子惠能禅师是“农禅并重”的真正践行者和体悟者。他在劳作中参禅悟道,精进修持。随着僧团人数的扩大且许多禅寺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地,若无农业生产而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难以为生,这使禅宗农业生产得以形成。马祖道一禅师(709—788)开丛林安禅侣为标志,禅者逐从律寺中独立出来而使禅宗农业独立发展,既得到社会和信众的土地供养,同时也形成特色农业生产。继而,禅师马祖道一以丛林为基础制定了丛林清规。

最终完成并确立“农禅并重”的是马祖道一(709—788)的弟子——唐代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宋高僧传·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①,即“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百丈怀海禅师依丛林情况制定《百丈清规》(最初名为《禅门规式》)“行普请法”:让全寺院集体从事生产劳动、自给自足并创立“农禅制度”。这一全新制度创立后,“天下禅宗,如风偃草”^②。百丈禅师每天除领僧侣修行外,还耕耘劳作,直到年老仍然劳作不辍,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中国禅林之千古名训。同时,茶也属于农的一部分,怀海禅师在《百丈清规》中也详细规定禅门寺院的禅茶以及行茶仪法。经过怀海禅师的丛林改制,由禅茶衍生出丰富的茶事,茶礼成为日常修行和参禅悟道的必修内容。以茶助禅的修行方式也逐渐成为禅门规制乃至修行所必须遵守的丛林制度。

唐宪宗元和末年,灵佑禅师在湖南伪山带领徒弟实行“农禅并重”,蓬莱山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带领弟子开垦三百余亩山田,种植十余棵松树^③。新罗国王子金乔觉于开元末年前后在九华山实行“农禅并重”,普愿禅师在贞元年间于池阳(今安徽省贵池市)南泉山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清静修行,普光禅师通过募捐购置千亩田地从事农业生产等。

千百年来,中国禅宗僧侣一直走在禅与农相互交融之路上。经由历朝多代的修订到逐步完善和广泛传播,“农禅并重”渐成为禅宗最重要的修行制度之一。随着元代《敕修百丈清规》由朝廷颁令全国,农禅制度最终被确立并成为僧众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需要说明的是,元代政府颁布百丈清规是蒙古人政府为了控制有异动倾向的汉僧,尽管客观上也起到促进“农禅并重”的作用。

梳理“农禅并重”的历史发展脉络(如表1所示)可看出,其是在禅宗基础上形成,加上寺院定居,而后逐渐形成一种自发行为的“农禅并重”,是佛教修行与农作逐渐磨合直至两者圆融为一体的发展历史过程。同时,不同历史阶段的“农禅并重”也蕴含不同含义,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相对于坐禅念佛之佛教修行的“农禅并重”;其二,是相对于印度供养制的佛教制度下的“农禅并重”;其三,是当代人间佛教的范畴的“农禅并重”,其中的“农”不仅是农作,而且是人间生活的代称。

表1 “农禅并重”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内涵

发展阶段	佛教修行与中国农业发展相结合	“农禅并重”的特点	“农禅并重”的内涵
前“农禅并重”时期 (隋唐之前)	佛教初入中国与中国农业文明相调适时	僧人与农业并不完全脱离	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①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大正藏》第50册,第771页上。

② [宋]普济:《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全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③ 罗莉:《寺庙经济论:中国佛道教寺观经济形态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续表1

“农禅并重”鼎盛时期 (唐宋时期)	中期发展的繁荣阶段 “农禅并重”	佛教制度层面且相对于印度供养 制而言更重劳作	劳作与修行并重
后“农禅并重”时期 (明朝时期)	后期逐渐衰落阶段	农禅并重成为中国禅宗的重要形 态	更注重精神修行

换言之,“农禅并重”从佛教修行的坐禅念佛,发展到作为中国僧人的食物供给制度,主张僧人自己通过劳动获得食物,变印度佛教僧人的“乞食制”为“自给制”,同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将劳作视为修行进而发展出“农禅并重”体制^①,后续发展并将其核心思想融入人间佛教并升华到中国佛教文化高度,直至当下“农禅并重”延展至生态保护与伦理道德修为的层面。可以看出,历经千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的“农禅并重”,不仅将农业引入中国佛教价值体系,从而使其超越生存与经济范畴而在佛教文化层面得以汇聚和升华,更为汉传佛教的传承和佛教徒的修行提供独具特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修行载体,且具有深远而多元的生存智慧与当代价值。

二、“农禅并重”蕴含的生存智慧

“大众尽心为常住开田,山僧尽心为大众说禅。”^②中国禅宗僧侣将静佛世界、成就众生的思想与农业劳作视做修行发展为“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将勤劳美德与禅修理论及实践相融合^③。把农作引入禅门,将生活、劳作与参禅修学融为一体,以丛林风规的形式得到巩固与落实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禅宗农业。可见,“农禅并重”将禅修与农耕劳作融合,即农耕劳作就是修行本身而非修行之外的方式,使具有浓厚出世色彩的佛教在入世的现实生活中扎根。打破了坐禅念佛之佛教修行需在远离喧闹的幽静地方静心调息获得智慧的修行方式,是直指本心的禅修悟道之智慧生存理念与方式。换言之,融禅于农,以农悟道,“农”与“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使原本被视为影响参禅悟道的农业劳作透露禅意并成为参禅启慧悟道的因缘。在愉快的农耕劳作中体会禅道、验证修行的境界并悟到禅修的真谛且开启悟道之路。

与此同时,此处的“农禅并重”不仅消解了“农”与“禅”的主要矛盾,而且在其融合的过程中切实体现了蕴含丰富多元的历史意蕴与深奥的生存智慧:第一,自耕自足消解农业劳作与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之间的矛盾而体现其安立之生存智慧;第二,“普请制”消解农耕劳作与僧人被尊重之间的矛盾而体现其平等之生存智慧;第三,“农禅并重”消解田间劳作与“成佛作祖”之间的矛盾而体现其圆融之生存智慧。即在多元的生存智慧中折射出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超越的这一核心实质,以下具体阐述。

(一)“农禅并重”中蕴含安立之生存智慧

在印度,佛教以戒律“不杀生”限制僧人参与农耕,只在人群聚集区教化众生。但当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僧人被迫退隐山林,原本的供养没有了,隐居山林的僧人只能自己种粮以自养。于是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带领僧徒众开荒种地,开中国佛教史僧人为养活自己而参与农业劳作之先河。怀海禅师在百丈山建立寺院、弘传禅法并依据佛教大小乘戒律制定了“农禅并重”,将农耕引入禅门,将两者融为一体并使之以丛林制度形式得以巩固和实践。从《传法宝纪》道信禅师提出“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

① 陈坚:《“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② [明]元贤重编《寿昌大明和尚语录》卷一,《已续藏经》第125册,第7页上。
③ 胡水凤:《东方禅文化》(第一辑)《百丈清规》对中国禅院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疮”^①,到百丈怀海禅师倡导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作为佛门的一项制度加以固定。

农禅并举从源头上解决了禅僧流动不居的生活习性,且推动禅僧不再单纯依赖社会资源而在生活中做到自给自足。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侣日常生活最重要理论约束的突破:佛教不杀生的戒律与农业劳作之间的矛盾,更是佛教历史上一次重大转变与飞跃。禅师开悟明心见性,引领僧众破除戒律了却精神禁锢的重负,切实映射出禅宗的安立之生存智慧。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其从宗教伦理和善恶的本质意义上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法性,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的融合。正所谓“垦土诛茅、运薪汲水、竖拳竖指之类皆自性天真之道用也”^②。同时,“农禅并重”出于适应现实和自身安立需要的生存方式与中国传统社会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为接近,因而,也使禅宗更易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固禅宗亦有“农民的佛教之称”^③。

(二)“普请制”蕴含平等之生存智慧

“农禅并重”的核心是“普请法”(常称“出坡”)。因禅宗寺院多在山间,每天需要到山上耕种劳作,所以叫“出坡”。其具体要求寺院“上下均力”并做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④,即“与众均其劳”的“普请”。可以看出,“农禅并重”中的“普请”是切实要求每一位僧众都必须参加耕种、采茶、收割等劳作活动,这是普请制的最基本特点,也与佛教思想本质层面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思想高度契合。这其中也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平等之生存智慧:

其一,从僧团层面而言,通过普请制消解了不参加劳动的特权。即在寺院中不论什么层级的僧人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如耕种劳作、寺院修建和田野开发等活动中,都需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论外部环境是风调雨顺还是灾祸连年,都将这一形成的集体共识性智慧运用到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过程之中。同时,通过此举,寺院中不同层级僧团的共同劳作更可凝聚不同层级僧团的集体智慧以形成共识和强大的凝聚力,进而通过集体智慧不断营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

其二,从民众层面而言,“普请制”中的“请”还是“请您参加农业劳动”之意,阐明参加农业劳动是受到尊敬的。因为依据佛经说法,从事佛教精神活动是受人供养和尊敬的。但是,此时的中国僧人却在田间劳动,如何能让众人起恭敬心并接受其教化?因而,在《百丈清规》中用敬词“请”,意为请您参加劳动而非您自己去劳动。这样一来,“普请”使得锄地插秧的农耕劳作已然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被视为如坐禅念经一样受人尊敬的禅修。可见,从两个层面的活动中,不仅消解农耕劳作与僧人被尊重之间的矛盾,而且体现平等思想并蕴含生存智慧。

(三)“农禅并重”蕴含圆融之生存智慧

农是世间法,禅是出世间法,但其与禅宗“禅茶一味”“禅农一味”在意蕴上具有一致性。这既是现实需求,更体现佛教的圆融智慧。从现实层面而言,僧人隐居山林只能自己种粮食以自养,由于僧人是修行而非劳动,白天劳动夜晚诵读念经坐禅精力不够。鉴于此,具有圆融和随缘的僧人“方便善巧”的将田间劳作视作佛教修行。从佛教层面而言,作为禅宗的修行方法,“农禅并重”视农作劳动本身就是禅修,而无需再进行农作劳动之外的修行。这正是《坛经》中“无相修行”(修行不需着相)的思想和“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⑤思想的体现(如念佛坐禅谓之“有相”),即指喝茶、担水、劈柴都是修行为异曲同工之妙。

① [宋]《传法宝记》,林世田、刘燕远、申国美编:《敦煌禅宗文献集成》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14页。

② 《天如惟则禅师语录》,《续藏经》第七十册。

③ 任继愈:《农民禅与文人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

④ 《乾隆大藏经》,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149):第826页。

⑤ [唐]法海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48册,第353页上。

百丈怀海禅师认为劳作本身就是禅修。“普请”农作在禅宗丛林中是“禅翁之意不在食而在佛”。禅学专家高令印先生在《中国禅学通史》中认为,将佛性等同视为劳作吃饭,意指禅宗的成佛观由传统的“禅修成佛”转入“劳作成佛”,这与天台宗所认为的“烦恼即菩提”^①有相通意涵,蕴含的“即”的原则与“农禅并重”相关。换言之,生活能引生烦恼与菩提,当下觉悟烦恼即菩提,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理念。“农禅并重”的农耕与禅修在现象层面看似不同,却在一定境界蕴含“农”与“禅”的圆融互通。

同时,禅茶起源于禅僧借助饮茶进行禅定,之后随着禅宗对佛教修行方式的变革逐渐上升为与智慧、觉悟等相连的“参禅”,成为佛教修行方式之一^②。如发端于中国禅宗史上最为顶尖的大师之一“赵州古佛”从谏禅师(778—897)的“吃茶去”就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关禅茶的著名公案,饮茶不是僧侣修行的辅助而是饮茶悟禅,从饮茶中体会菩提与烦恼。看懂一切继而参悟一切。悟见本心,茶心禅心本心,三心相印。

从以上可以看出,“农禅并重”蕴含丰富多元历史意蕴与深奥的生存智慧。“农禅并重”将禅定修行(出世间法)与农耕劳作(世间法)等生产活动界限打破,使原本具有非常浓郁的出世色彩的佛教融于现实劳作与生活而体现禅意。如田间锄地中“成佛作祖”,即摘茶、触地、劈柴农活皆为禅,无二无别。同时,在禅宗的鼎盛时期,农事成为禅的核心主题,农事成为门人参学发悟、祖师示法接引的最重要途径。黄檗开田择菜,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③。慧能在“破柴踏碓”“腰石舂米”中悟道,五代僧人布袋和尚在插秧时悟到“插秧偈”：“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④这些在农事中的悟道得道堪称“农禅并重”之经典。可见,“农禅并重”消解了农耕与参禅之间的矛盾,让农耕劳作已成为触类见道和直指本心的禅修悟道方式,而且在坚守大乘佛教的根本理念的过程中体现出其圆融的生存智慧。

也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认为的,“农禅并重”不仅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农耕文明的视域之下,其拥有的丰富历史意蕴及内在价值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农禅并重”的合理内核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生态理念下提出走向自然的进程中,须立足当代使之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代价值,这是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的一大贡献。不仅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手段^⑤,而且禅宗旺盛的生命力在世俗生活中切实得以体现、发展实现永久接续。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作为厚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农业文明的优良传统,而且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谐理念和自力品格,对于促进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更有启示意义。固而,汲取“农禅并重”的生存智慧之精粹,在当下适度范围内,以前瞻而慈悲的眼光,对其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意涵层面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予以阐发和演绎。

三、“农禅并重”的多元价值

任继周院士认为应对客观外在世界始终怀有感恩、包容、分享和随缘之心,这与净慧法师所认为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相一致。在尽责之心中求得心理的知足,在奉献之情中求得美满。可见,“农禅并重”的禅宗理念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还涉及人的内在精神、伦理道德和修行悟道,是当下调整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新途径。

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农禅并重”不单单是农业新形态,更是对古代“农禅并重”的不断升华与发

① 圣严法师:《禅的体验·禅的开市》,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② 杨小平:《禅茶中国化的佛教修行方式》,《中国宗教》2020年第6期。

③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④ 虚云:《开示虚云老和尚说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 任继周:《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第12-16页。

展。“农禅并重”不仅解决物质问题,而且提供人们缓解压力、放松身心、耕读传家、驱除功利并不断修正心性的方式,其是对物质世界超越性的表现,这种超越性更好地引导人们与环境和谐相处。因为“心灵健康与物质福利并不是敌人,它们是天然的盟友。”即宗教的精神准则与当下实践价值观在适度范围内融合而体现其生存的多元价值和智慧。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勤劳、自立、节俭、朴实的美德,也是农业文明所涵养的有助于传统社会稳定的美德,在禅修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中实现完美结合,从精神和伦理层面使得农业生产劳动对于佛法而言具有合理性。而且作为一种崇尚、顺应、回归、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理念也蕴含多层面价值,以下具体解析。

(一)“农禅并重”蕴含保护与顺应自然以对万物至善的生态价值

“农禅并重”对待天地自然是不破坏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农作理念,即“农禅并重”中蕴含丰富的生存、圆融互通之核心是对天地自然至善体现“万物并行而不害”的伦理意念和内在价值。正如慧忠国师(675—775)提出的“无情说法”,“无情”是自然界的草木瓦石和山涧流水,是天地自然的生态环境。禅宗对待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是用止于至善之心对待自然天地中的佛山佛水。“农禅并重”蕴含的修行智慧,引导人们尊重土地自然生长的规律和生命的开放,坚守和善的至高至坚的信仰^①。

现今,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土地索取与回馈的失衡^②、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等各种现象。正如《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所言,一切结果和回报都是由原因引起的。“因”和“业”都是原因(种子);“果”和“报”就是“因”和“业”所产生的结果(果实)。E·F·舒马赫主张合理利用土地,采用既能提高土壤生产率又能保持土地长期完好无损,实现农业生态保护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减少有害物质投入的方法。而在如何减少过度开垦和农药使用方面,如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农禅并重”中蕴含的善待天地的理念和优良的实践则值得借鉴。

例如:湖南省常德市津市药山镇药山村境内药山寺明影法师,用原生态方式在300多亩福田耕种水稻、草药和蔬菜,采用植物酵素改良土壤和驱虫,轮作休耕、间作套种。不仅是对古人尊重天地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后人永续耕种的负责。正如法师自己所认为的,在农禅修行当中,药山寺广种福田不仅利于当代,更是一种修行,把“生活禅”的内涵付诸实践,通过打坐禅修、体验农事、行脚山林等活动,用感恩的心回馈大地,用分享的心与大众结缘,在劳动中觉悟天地因缘与人生的生命圆相。

禅宗主张“万物一体”,善待大地自然会回报最好的果实。通过农业生产劳动生动地诠释着业果法则和自然的力量。在与相关事物发生协变时保持生命力的循环就是遵循生命力本身流动的规律,遵循农业耕种的天时地利,进而,在物质和精神上达到生命循环往复与大地和谐相生。使人们萌生对大地的感恩心,对食物索取有度。这既是“农禅并重”的生动实践,更是对保护和顺应自然以对万物至善思想的真实诠释。

(二)“农禅并重”蕴含触类见道与缓解压力以己为善的社会价值

“农禅并重”蕴含的社会价值体现为一种质朴纯真的生活信念和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蕴含内在精神和伦理价值,并且提供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压力的多种选择。在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体悟、领悟禅的真谛,在与己为善中达到无我境界^③,进而体现其当下的多元社会价值。

其一,“农禅并重”基于中华农耕文明的特点将禅法融入世间,将“寓禅于农,农中悟禅”的农禅思想融于实践。佛教修行不仅是息心静坐,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禅意流动。农业生产劳动不仅是生存方式,更

① 蔡泽旭:《禅学,取之不尽的心理学资源宝库》,第六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中国心理学会,北京,2012年7月6日。

② 任继周、方锡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兼论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中国农史》2019年第3期。

③ 王虹:《关于王维的禅悦诗创作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2012年第5期。

是一种“触类见道”的生活方式。如湖南佛学院师生稻田插秧践行“农禅并重”传统,在长沙县金井镇九溪古寺农禅园,下稻田插秧,让人们通过农忙践行体悟农与禅并重的修行。因而,“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工作即修行”“生活即修行”是一种不同以往的自身内在修为的观念和生存方式。

其二,“农禅并重”与茶禅为当下的人们提供缓解来自生活、工作、社会等各方压力和心理寄托的多重选择。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到佛教道场去体验“农禅”,在参禅中体悟进而缓解压力,让生活回归质朴本真。在香港大屿山宝林寺住的几十人自己种菜、搬柴、运水体验禅修与生活^①。一些近郊农场为参观和体验生活的居士、游客、志愿者们提供环境优美、亲近自然的农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农场后,在没有隔阂,没有身份差异的劳作中一起耕种,消除了人们的分别心,放松身心,将被动劳作变为主动耕种的禅宗修行,在劳作中与他人善,齐心协力,培养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共同付出与共同分享的和合精神,同时在劳作中减轻各种精神压力,让高强度工作节奏得以缓解的同时,心灵也得到安慰、安顿与安放。同时,在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故里,广州云浮新兴县将禅文化与象窝的茶产业结合,营造以茶叶为基础以茶禅文化体验为主题的休闲度假、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禅茶文化展览等多维一体的禅茶度假生态园。即“山中有云、云中有茶、茶中有禅”的人间天堂。让人们在感受禅茶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茶旅融合发展。可见,“农禅并重”提供当下紧张生活的人们以心理慰藉的多元选择进而达到以己为善直至无我的境界。

(三)“农禅并重”蕴含伦理美德与耕读传家不断践行的文化价值

“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②,不仅能砥励心志,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禅林中的具体体现。百丈怀海禅师践行“普请”并将其与佛教的其他修行方法,如打坐、经行、拜佛等量齐观。藉以训练僧众辛勤劳作,还蕴含感恩供养、慈济天下和耕读传家的社会价值。

其一,将不劳作不得食的观念根植于心并加强道德修养。“农禅并重”的生存方式使“禅”建立在劳作之上,是具有更高认知水平的修行方式。佛教生存不仅是耕好自己的心田,还以众生为田,将生存与劳作的美德予以传播,传承朴实无华、勤俭质朴的生存文化形成感恩之心进而达到至善。正如净慧法师所认为的,虽然当代的中国佛教寺院有着健全的供养制度,出家人衣食无忧,根本不必“出坡”农作而“为稻粱谋”,但佛教僧团依旧坚持“出坡”以自规,源于其可培养“平民化”的道风且有助于形成“感恩”十方供养之心以慈济天下。

例如:江西省永修县云居山真如寺在宋代盛行“农禅并重”,虚云和尚主持“真如禅寺僧伽农场”开创云居山真如寺的农禅新制,寺庙周围稻田均为寺僧自耕自食,每年所产的茶叶、粮食和蔬菜不仅自给,还用来赈济附近的贫困居民。河南洛阳白马寺的僧人在诵经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并将自耕自种的黄豆送给敬老院、孤儿院及香客。广州东华禅寺是农禅并重的道场以农养寺,等等。

其二,“农禅并重”与“耕读传家”都是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是家国情怀与三农情感的重要践行路径与当代价值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2021)中指出,“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④。耕读教育践行“亦耕亦读”,在弘扬中华耕读传家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关键作用^⑤,也正如两宋之际李石在眉州劝谕百姓耕读结合时所云“俾田与孝同力,稼与学并兴。”^⑥这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举的模式,既是

① 茗山:《茗山长老文集》,中国江南文化书院,2014年,第88页。

② 《宏智禅师广录》卷8、卷4,《大正藏》第四八册,第110,35页。

③ 青平、吴晓斌、刘震:《新时代涉农高校实施耕读教育的现实价值与路径》,《中国农业教育》2020年第6期。

④ 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⑤ 马俊亚:《世本无圣:明清常州舜山地区乡村士子的耕读实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⑥ 李石:《方舟集》卷18《眉州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49册,第749页。

生产又是生活,更是知农爱农的重要落实路径。读万卷书本身就是走万里路,两者蕴含辩证统一且相融互通的智慧。

可见,“农禅并重”将禅法融于世间,即“寓禅于农,农中悟禅”^①,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勤劳自立、朴实的美德与禅修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进行完美结合。作为一种生活信念和行为方式,悟道“道树开花,禅林果出”。如虚云大师所说的锄田种地就是生存,就是佛法^②。在劳作的禅机中忘我,在修正中不断走向至善的正觉。从事农业生产的劳作本身是“观音入理之门”^③,也是生活禅修的延展传播。“农”与“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农业耕作不再是与修禅无关的经济手段,而是处处透露禅的妙机,成为参禅启慧悟道、缓解压力、提升道德修为的因缘和多元选择,在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多重价值层面体现人与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共生。

结 语

农业孕育文明,更是美德之光照耀在大地上的生命意象。“农禅并重”将禅修之精要贯穿于大地之上,浸润在劳作之人手中,在耕作、生活与工作中,既是耕耘又是修心,在耕种文化与禅修实践交融中体现其独特之处。可见,人与自然的相遇是不断渐进生命的圆相,是在耕种的过程中对种子、土地、果实付出的艰辛劳作之路,是不断自我修正、检视、自性和正觉之路,是将自己的心性与佛性显现出来,发挥自然妙用的化世功能把烦恼逐渐克服之路,更是人与天地自然生命至境的和谐共处之道。与此同时,“农禅并重”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具有维护中国农业与佛教的作用,是中国佛教的生存状态。作为当下中国佛教和文化存在形式之一更聚焦对古代农耕文明的精神保护与当代的传承。那么,前行中的我们,应具有更前瞻的眼光和更高的责任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农禅并重”的生存智慧,使人与天地和谐共生,使内心升华以不断达到生态、社会与文化的至高至坚至善的境界。

[致谢:文章撰写及修改过程中,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建光教授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建议,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李良木)

[参 考 文 献]

- [1] 王建光. 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J]. 中国农史, 2005, (4).
- [2] 鞠彩萍. 唐宋禅籍署称的深层文化折射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 (5).
- [3] 陈坚.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 [4] 王鸿生. 中国农业伦理学应该研究的九个问题[J]. 《农业伦理学进展》(第一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5] [宋]普济, 苏渊雷点校. 五灯会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6] 圣严法师. 禅的体验·禅的开市[M]. 台北: 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 [7] 陈兵, 邓子美.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 [8] 罗莉. 寺庙经济论: 中国佛道教寺观经济形态探析[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① 蓝吉富:《从“道树开花,禅林果出”》,《禅宗全书·史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② 丹明汇:《虚云大师说禅》,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序言。

③ [宋]普济:《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全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页。